

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

单补生

史事经纬

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从1928年到1948年的20年间，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著作和实践经验，并开始了武术竞技化、规则化、教材统一化的尝试；同时通过对外交流，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对近代武术的发展、传承和推广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国术研究馆”到“中央国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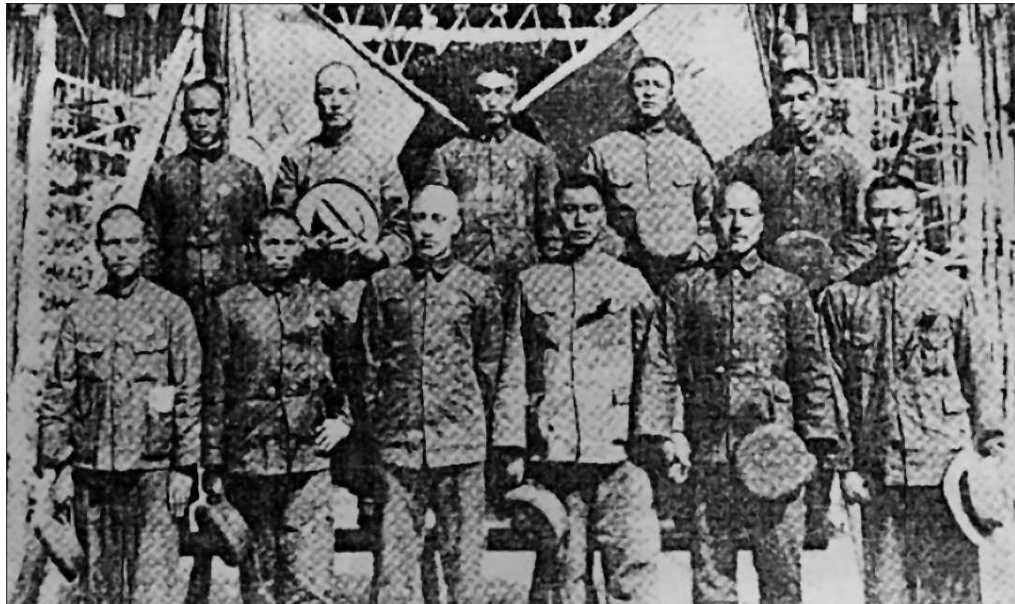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武术名家，他们在弘扬中国武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时民间的武术存在着“门户之见”，在传授上更是“传内不传外”，有着极为严格的传授规矩。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白刃对抗技术，民国军队的军事教官经常在训练中传授武术招式。如西北军的冯玉祥在训练士兵时，就经常让士兵操练大刀。再如黄埔军校成立后规定，“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

1927年，退出军界的西北军将领张之江认为：要发展武术，必须先把这些各门派的武术设法融合起来，这样才不会引发门户之争。于是，他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成立“国术研究馆”的建议。张之江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备案，遭到拒绝。张之江又找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李烈钧表示支持，还提出“国术研究馆”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当时，另一位民国将领、武术名家李景林正在上海设立武馆招生收徒，张之江便请李景林担任副馆长，又召集了多名武术名家共同筹备建馆工作。

1928年3月15日，“中央国术研究馆”经国民政府批准准备案，于3月24日正式开办，馆址位于南京韩家巷；发起人于右任、李济深、李烈钧、冯玉祥、张之江、李景林等33人；馆长为张之江，副馆长为李景林。6月，研究馆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隶属南京国民政府，由财政部每月拨给经费5000元使用。1929年，馆址迁徙至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

该馆于1929年进行改组，设理事会，负责议定重大馆务事项，由冯玉祥担任理事长，并设参事会，聘请名人担任参事，每季度召开参事会议。改组后的“中央国术馆”下设教务、编审、总务三处。其中，教务处负责教学，培养师资；编审处负责编辑教学资料，审定教材，整理武术传统项目；总务处负责行政后勤、财务、文书等工作。此外，“国术馆系统”由“中央国术馆、省和特别市国术分馆及市、县国术支馆，区国术社，村、里国术分（支）社组成”，并聘请知名人士及武术专家为参事。

► 第一届“国术国考最优等者”合影



武术教学和理论建设并重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聚集了一批知名武术家，开展教学、辅导工作。“中央国术馆”除设有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包括女子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外，又于1932年在南京孝陵卫设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传习所”招生限额120名；入学资格为：（一）高级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二）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生；（三）专门军事学校毕业生。不久，“传习所”改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至1936年又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三年，本着“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精神，课程分学科、术科两类，“国术、体育、军事三者并重”。到1945年8月，学校共毕业5届学生500余人，被纳入国民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学籍登记范围。毕业生中的大部分被分发于军队、军校任“国术教官”。抗战期间，许多在“国术馆”学习过武术的学生，纷纷投身于战场，为保卫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央国术馆”组织编写了大量武术书刊和理论报道，对武术理论建设和技术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央国术馆”出版刊物有《国术周刊》《中央国术旬刊》《国术统一月刊》等。为了进一步把武术发扬光大，张之江又联合武术界人士，将各门各派的武艺，在刊物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解说及拆解。出版的图书有《国术手册》《古今国术兵器图考》《查拳图说》等。此外，“国术馆系统”由“中央国术馆、省和特别市国术分馆及市、县国术支馆，区国术社，村、里国术分（支）社组成”，并聘请知名人士及武术专家为参事。

举办全国性国术考试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后，为“摒弃门户之见，任人唯贤”，仿前朝武举考试和近代体育赛制，举办全国国术考试（简称“国术国考”），“以考评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为目的，选拔各类武术人才”。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应为每年一次国术国考，因种种原因，实际上仅于1928年和1933年组织了两次“国术国考”。

1928年10月15日，声势浩大的第一届“全国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考试委员长张之江，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国民政府代表李济深、军政部长冯玉祥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到场演讲，还有许多人向团体送来匾额、对联以示祝贺。

“预赛”为各地“国术馆”选拔出的参赛者进行武术套路表演，有拳术、长兵、短兵（包括拳术、枪、棍、刀、剑），合格者200余人参加“正试”。“正试”为“双人对抗”，项目分为散打、摔跤、长短兵、对劈刺等，采取单淘汰制，不分年龄和体重，用抽签的方法来进行配对比赛，每对选手三局两胜，胜者进入下场比赛。最后还有试卷题，考题有“中国国术起于何时？试举所见”等。

此次“国术国考”于19日结束。“国术国考”由评判委员长李烈钧、马良主持，评出应试员最优等15名、优等38名、中等82名、及格163名。“国术国考”前三名被授予“国士”“侠士”“武士”称号。“中央国术馆”理事长冯玉祥为最优等者颁发证书。

第二届“国术国考”于1933年10月20日仍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本届“国术国考”较第一届准备更为完善，其宣传方法也别出心裁，动用飞机散发传单、汽车彩幅、电台广播等形式，并请航空署派飞机在开幕式中进行飞行表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中央各部院代表200余人、全国“参考选手”四五百名、观众万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国术国考”预赛、正试和上届基本相同，笔试题目为“国术怎样可以普及全民？试言其详”“直接比试与间接比试之关系如何？试详言之”“国术内外家创自何人？试答之”“国术学与国学如何分别？试申言之”等。第二届“国术国考”于30日结束，最终评出：甲等34名，乙等39名，丙等91名，共164人次。因奖品种类繁多，特依据甲乙丙等依次抽签分发奖品。

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曾多次组织人员到国内外进行武术表演、交流。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期间，国民政府派中华代表团参加，张之江率“国术队”随团前往表演、交流。“国术队”共7名队员（男子4名——张文广、温敬铭、金石生、郑怀贤；女子3名——傅淑云、刘玉华、翟澹源），其中张文广、温敬铭、傅淑云、刘玉华4人为“中央国术馆”选送。奥运会开幕前，“国术队”就已开始了表演，向世界展示中国武术的魅力。7月25日他们应邀参加万国音乐会，在台上进行了10多分钟的表演。首先是金石生演示拳法，继以刀、枪、剑、叉等兵器进行单、双表演，尤以刘玉华与冠冠兴的单刀对枪，傅淑云与刘玉华之对拳，还有郑怀贤的飞叉，令观者目眩神夺。30日，“国术队”除表演武术，还由翟澹源表演踢毽子，让观者发出阵阵喝彩。8月11日晚，“国术队”在露天剧场表演，首先是太极拳，次为各队员的单拳对练，再次为器械飞叉表演，共分20节，历时1小时，博得3万余观众的热烈掌声。8月16日奥运会闭幕后，“国术队”受邀到多个城市巡回表演。

“国术队”的表演引起了武术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媒体纷纷称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令人不可思议，它有一种难以写出的内在的旋律感”；奥运会摄影队还为傅淑云、刘玉华、张文广、温敬铭等人的表演摄制了录像片，作为资料保存了下来。这次出访极好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武术，奥运会为此给国术队和张之江颁发了奖章、纪念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除四川等大后方“国术馆”继续活动外，其他相继停办。9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南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迁徙，一路坚持办学，曾组织培训、巡回表演，并举办比赛。抗战胜利后，返回国术校舍已毁于战火，1946年10月，“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迁到天津复校开课；1949年8月，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遂更名为“天津河北师范学院”。 “中央国术馆”则于1946年迁回南京，在廖家巷张之江公馆临时办公，继为经济所迫，于1948年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系北京民国国史研究者）

“马营”起义前后

贾晓明

编后拾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山东。1938年1月，爱国志士马骥、马耀嵩在家乡莒县自发组织了3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马耀嵩任队长。3月，游击队被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收编为莒县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1939年又被改编为国民党山东省暂编第一师第一旅三团二营，继而成为该旅独立营，下辖5个连和1个特务排，马耀嵩任营长，马骥任副营长，徐飞任教导员。该营一连长马骥兼任，二连长马洪祥，三连长马欣祥，四连长马庆祥，五连长郭现臣，特务排长马玉芬。因该营战斗力较强，风纪较好，在群众中比较有影响，营干部中大多姓“马”，相互之间又存在家族关系，所以被群众习惯上称作“马营”。

1938年7月，马骥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学习，马骥对政治工作理论、军事技术、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为扩大抗日力量，中共鲁中区党组织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马骥的推荐下，先后向“马营”派出20余名干部，其中，马醒悟任营供给处主任，李自新任营教导员，张星五任营部宣传队长，其他人分别任政工或后勤干部。

“马营”营长马耀嵩对八路军派来的干部非常信任，支持他们开展工作。在该部的中共党员帮助“马营”扩大队伍，进行抗日宣传，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该党支部由鲁东南特委直接领导，由副营长马骥任支部书记，一连连长马鸣久任组织委员，马宝生任宣传委员，同时发展了部分骨干分子入党。

此后，许树声追随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沈鸿烈，推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对八路军制

造摩擦。1939年夏天，日军进行大“扫荡”，许树声命令“马营”和他一起北逃安丘。“马营”的大多数官兵对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极为不满。在“马营”工作的中共党组织及时揭穿逃跑避敌的阴谋，鼓励官兵留下抗日，得到全营官兵的拥护。马耀嵩与马骥召集干部会议宣布：“一定同日军血战到底！”许树声怀疑“马营”内部藏有共产党人，就派人向“马营”进行“整顿”。八路军非常关注“马营”的发展动向，及时组织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安全撤出，并指导未暴露的党员坚持斗争。

1940年春，许树声突然传令让“马营”偷袭八路军，并派出嫡系部队督战，妄图破坏“马营”和共产党的关系。马骥抢先一步通知八路军转移，让许树声的诡计没有得逞。此后，许又多次向马营安插亲信，都被退了回去。许树声又打算到“马营”“点名发饷”，进行“清洗和改编”，都因“马营”战斗力较强，官兵团结一致，一时未

能得逞。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党组织认为“马营”起义时机已到。1940年4月，马骥、马醒悟从驻地陈家庄到日照粮山口，向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司令员刘涌汇报了情况，共同研究了起义行动方案。

返回驻地后，由马骥、马醒悟主持，秘密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对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全营5个连1个特务排，其中第一、第四、第五连和特务排基础较好，马鸣久、马玉芬有把握把这部分人全拉出来，第二、第三连群众基础差些，连干部守信、谭锡三只拉出一部分。起义的关键是营长马耀嵩。由马骥、马鸣久、徐少泉去做工作。马骥等人向马耀嵩分析了“马营”当前的危险处境，指出只有起义是唯一出路，并说明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随后，马骥等人立即向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孙泽民汇报，为防情况有变，决定4月5日立即起义。当晚，起义部队拉出村去，然后副营长马骥、教导员徐少泉两人通知营长马耀嵩。马耀嵩接信后，立即与警卫员到二支队司令部，表明了起义的决心，至此，“马营”官兵全部起义。起义后，“马营”改编为八路军山纵二支队驻莒县独立团，马耀嵩任团长。

红色足迹

吴山庙起义

杲学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消息传到安徽合肥，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许习庸立即召集了一批革命人士，积极策反各乡区的民团，准备择机起义占领合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许习庸等人认为武装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董伯荣前往武汉，向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请示。

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听取董伯荣的汇报后，对合肥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当即指令国民党党员许习庸、董伯荣，共产党员蔡晓舟、聂鹤亭、郑鼎等为负责人。不久，蔡晓舟、聂鹤亭、郑鼎秘密来到合肥，同许习庸等人在合肥北乡组织了以寿县古渡岗李雨村民团和合肥东乡民团为基本力量的地方武装，并制定出寿县、合肥的武装起义方案。

11月11日清晨，合肥县衙突然命令参加起义部队即刻移防回城。许习庸立即赶往古渡岗，向蔡晓舟、郑鼎报告了情况。蔡晓舟等经过分析，判断敌方可能获悉情报，决定立即宣布起义。

各路起义队伍300余人，当晚星夜兼程向吴山庙小营盘集结待命。12日，蔡晓舟等人在吴山庙小营盘树起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并成立“国民革命军安徽讨贼第四路

军”，推举蔡晓舟任司令，郑鼎为指导员，许习庸为副司令，董伯荣为参谋长，李雨村为总参议。根据郑鼎的意见，对起义队伍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革命教育和组织整顿，公布了起义军的纪律。

合肥城内的敌人得到吴山庙起义的消息后，急电安徽军阀调兵援助。按照预定行动计划，起义军于11月23日凌晨4时整装出发，准备进攻合肥城。天刚拂晓，安徽军阀调集一个旅的兵力赶到合肥北乡四十埠，用大炮连续向小营盘方向轰击。起义军在枪林弹雨中，勇猛逼近四十埠，与守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攻克了敌人的外围阵地。

安徽军阀得到报告后，急调3个团并配以多挺机枪赶来增援。起义军和敌人激战终日，终因寡不敌众、子弹短缺，不得不于傍晚撤回古渡岗。起义军撤退到古渡岗后，安徽军阀立刻调集大军“围剿”。为保存有生力量，起义军司令部研究决定：部队化整为零，疏散隐蔽，伺机再起。蔡晓舟、聂鹤亭、郑鼎、许习庸等前往武汉，加入了北伐军，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吴山庙起义“打响了合肥地区推翻军阀统治的第一枪”，不仅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更成功鼓舞了安徽人民斗争的勇气，点燃了江淮大地迎接北伐胜利的革命火种。

段玉林设伏歼敌

吕勃东

1929年6月，中共鄂西特委将鄂西游击大队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将第一中队扩编成鄂西游击总队第二大队，辖3个中队，段玉林任第二大队大队长。

段玉林和不久前来到洪湖地区工作的许光达、孙德清一起，领导部队战士们开展军事、政治整训。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第二大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随后，段玉林派各中队分别深入到监利县沿江地区和石首县小河口一带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协助当地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武装，开展打土豪和减租减息斗争。

7月初，段玉林率部粉碎了敌人对小河口根据地的“围剿”。随后，他率部进至沙口子，消灭敌一个连的兵力，缴获新枪70多支。8月初，他率队和当地赤卫队员于李家嘴一线，拦截了敌一艘运送武器的轮船，缴获90支步枪、11箱子弹和一个押送排的武器。

8月，国民党独立十四旅和新编第一师等部，纠合沿江各县地主武装，以重兵向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华容根据地疯狂“清剿”。段玉林指挥二大队，与敌人周旋数日后，在一弓堤设伏，把企图偷袭冯家湾红军医院和兵工厂的敌军一个营全部歼灭。尔后，游击队转战华容，出奇制胜，全歼敌两个民团。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集结兵力，向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发动更大规模“围剿”，石首县的敌团防局长张家春纠集石首和藕池的团防兵300多人，于11月23日乘船向小河口

进攻，扬言要在三天之内把小河口的革命武装“一扫光”。

段玉林在接到侦察员和群众的敌情报告后，立即和许光达、孙德清进行了研究，很快确定了一个“瓮中捉鳖”战术。

24日上午8点多钟，张家春亲自带领敌人乘船在老关靠岸，向小河口扑来。当这伙敌人进到离小河口数百米的地方时，遇到了游击侦察小组的“抵抗”。敌人不久便“打退”了游击侦察小组，向村内冲来。敌人来到村口时，又听到了几声稀疏的枪声。张家春以为村内游击队人数不多，便留下100多人在村外“扫清”游击队的阵地，由他亲自带领200多人冲进村里。进村后，由于道路崎岖狭窄，张家春就把团防兵分成几股，沿着各条小道在村中搜查游击队，但找了半天，不仅没发现一个。

此时，埋伏在村外的段玉林见时机成熟，立即命令展开进攻。游击队员先用村口用火堆封锁，断敌后路，然后分成3队，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敌人彼此孤立无援，很快被消灭大半，张家春被游击队俘虏。

村外敌人发现主力被包围，立即向江边逃窜，好不容易逃回岸边，正要开船逃命，发现轮船的螺旋桨不知何时已被破坏。段玉林和游击队员们随即赶到，立即发起猛攻，同时派出数艘小船在上下游实施堵截。船上的敌人乱作一团，不久便举手投降。此次战斗，游击队全歼来犯之敌，缴获轮船1艘，拖船3只，机枪4挺，长短枪2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史海观澜

四三四团浴血鹁子涧

黄宗慈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程继贤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二师四三四团团团长。8月下旬，日军进逼山西，他屡次要求上前线杀敌。9月下旬，程继贤奉命率全团参加平型关战役。

到达战场后，该团奉命解救出被围的友军部队，继而又向日军发起追击。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的追击，一面拼命抵抗，一面从各处抽调部队来援。一部日军从侧翼迂回，占据了鹁子涧。鹁子涧位于团城口和迷回村之间，是平型关西面的屏障，日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即可进入山西省北中部地区，对繁峙、代县、忻口直接构成威胁。四三四团接受了夺回这个战略据点的任务。

9月25日拂晓，程继贤命令：第二连对右侧敌人加强警戒，必要时予以攻击；第一、三两个连作为预备队，掩护主力进攻鹁子涧之敌；第二、三两个营和追击炮连各自担任主攻。战斗打响前，程继贤对全体官兵训话：“我们要不惜任何牺牲，夺回鹁子涧，大家只准进，不准退。”

战斗打响后，程继贤率领官兵分路向扼守鹁子涧的敌人发起猛攻。在四三四团的英勇冲杀下，日军支持不住，很快向两侧山地逃走。上午10时，四三四团攻克鹁子涧。中午12时，敌人重新组织力量，在炮火的掩护下从两侧山地向鹁子涧反扑。程继贤沉着指挥，全团官兵在装备、补给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和敌人展开激战。担任警戒任务的第二连，为了牵制敌人，以排为单位，分批向敌人展开连续进攻。守卫鹁子涧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将进犯敌人击溃。此后，四三四团又连续夺下多个阵地，把日军近千人压



程继贤

缩到鹁子涧东南。

此后，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程继贤和四三四团官兵士气大振。程继贤立即派出侦察兵向大、小含水岭搜索前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准备绕至日军侧后方，进行牵制袭击；同时又派出一营打通和友军的联系，准备协同主力向团城口阵地出击。

由于敌人的机械化旅团一部赶来增援，程继贤和四三四团虽然和敌人英勇奋战数日，但因日军火力强大，始终未能突破日军阵地。

战至9月28日，团城口一线的友军阵地失守，日军长驱直入，四三四团遂陷入日军重围。程继贤和二连营长傅占魁、三营长梁世荣率部队分头应战，与日军反复拼杀，终因弹尽援绝，程继贤及所率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在六郎城附近的四三四团一营一部经血战后成功突出重围。